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西安事变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景选平



西安事变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7
ISBN 7—5034—1254—2

I. 文... II. 全... III. ①文史资料—中国②西安事变(1936)—史料 IV. K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5467 号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装: 河北省邮电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50.25 (全书总印张: 1491.25 印张)

字 数: 1161 千字 (全书总字数: 34453 千字)

印 数: 2000 册

版 次: 2002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00 元(全书 26 卷)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西安事变

主 编	赵 杰				
副主编	雷 力	徐万轩	孙景光	李兴泰	
编 辑	周 毅	张德良	温永录	王庆丰	赵 杰
	武育文	王 驹	王秉忠	刘忠刚	李治邦
	雷 力	徐万轩	李 荣	肖小宁	周斌生
	李云峰	王 平	马建昌	王 兰	田建军
	刘东社	陈 钊	王殿虎	王连祥	张维录
	孙景光	李兴泰	孙 援		

目 录

西安事变的回忆	卢广绩 (1)
西安事变及其前后的片断回忆	谢 珂 (15)
张学良与西安事变	张潜华 (30)
西安事变片断回忆	李默庵 (44)
西安事变见闻	谢晋生 (47)
蒋介石瓦解东北军的一次阴谋	何柱国 (76)
东北西北两军由猜忌进入合作二三事	卢凤阁 (78)
事变前一年国共联合抗日谈判的经过	谌小岑 (83)
从我所了解的一些情况来看蒋介石的卖国行径	钱昌照 (92)
张学良将军事迹之追述	高纪毅 (94)
我所知道的张学良将军	洪 钊 (107)
白山黑水忆将军	高存信 (114)
关于张学良的资料	汤国桢 (120)
杨虎城将军部队的片断情况	李百朋 (122)
对李志刚所写《回忆杨虎城将军和他与蒋介石的关系》补充	陈子坚 (124)
鄂陕随军杂录	惠德安 (139)
谈西安事变以前的西北“剿总”	刘多荃 (151)
王曲军官训练团	林世权 (159)
劳山战役	周祖尧 (163)
陕北甘泉劳山战役	韩鸿兴 (167)
东北军一〇九师陕北被歼记	马锡钧 (169)
第一〇九师直罗镇被歼记	沈叔明等 (173)
第一〇七师围攻红军的事实片段	李树桂 (178)
第六十七军“围剿”红军遭惨败的事实片段	李树桂 (180)
关于东北骑兵军在西北陕甘时我的见闻	汪 璐 (184)
洛川前进指挥所	李传玺 (190)
西安事变之前的张学良将军	应德田 (192)
我对洛川会谈的回忆	李荫春 (197)

延安会晤前后	李 维 (204)
从洛川会谈到延安谈判	戴镜元 (208)
西安事变琐忆	佟铁肩 (215)
西安事变前夕的学生请愿游行	何 尤 (223)
张学良将军对学生的一次讲话	王世芳 (225)
事变前后西安学生运动座谈会纪要	刘兰生等 (227)
钱大钧谈西安事变	钱东亮 (238)
张学良到西北后在政治上的一些措施	张政枋 (241)
1935 年中共同杨虎城将军谈判的一些情况	汪 锋 (251)
关于西安事变前后部分参考材料	王菊人 (254)
难忘的 1936 年	宋 黎 (256)
与西安事变有关的思想准备	孙铭九 (265)
言犹在耳	万 毅 (274)
东北军学兵队史实	任志远 卫 之 (277)
关于刘澜波的两次被捕	李春润 (286)
“艳晚”事件	宋 黎 (288)
胡宗南部在西安事变前后的活动	范汉杰 (297)
高崇民与西安事变	梁蔼然 (301)
我所知道的西安事变	李直峰 (304)
西安事变片断	郭 勉 (313)
西安事变见闻	李铁醒 (316)
参加西安事变的回忆	葛志先 (330)
葛志先《参加西安事变的回忆》一稿审查意见	李铁醒 (333)
起用白、刘前后	陈大章 (343)
白凤翔师长应召	李上林 李元超 (347)
从临潼捉蒋到降日被害的白凤翔	陈静波 (353)
西安事变中的刘桂五	程海岑 (356)
回忆包围华清池及其他	张雨辰 (360)
重游华清池 回顾捉蒋史	王玉瓚 (363)
西安事变捉蒋的一些参考资料	王玉瓚 (372)
西安事变简记	金骧平 (376)
华清池捉蒋回忆	张化东 (381)
华清池见闻	俞承淦 (384)
回忆临潼兵谏	何 克 (386)
骊山捉蒋记	马体玉 (389)
拘留中的蒋介石	宋文梅 (391)
看守蒋介石三日记	王志屏 (396)

“双十二”事变前后	胡广和 (398)
西安事变的几点回忆	刘海山 (406)
西安事变亲历记	汪日章 (411)
我所知道的西安事变	任作楫 (421)
所见所闻的西安事变	秦诚至 (429)
西安事变中一些事件的见闻	孙达生 (433)
西安事变前后的新闻宣传工作	张兆麟 (439)
鼓动西安事变的三支歌曲	商同昌 (447)
关于发动西安事变时间一段曲折的回忆	李志刚 (448)
护送周副主席赴西安的经过	王 英 (458)
忆我参加西安事变	胡廷俊 (464)
我在西安事变中的经历	陈洁生 (466)
关于“双十二”事变的前后	张骏京 (470)
对于“双十二”的回忆	程鹏九 (471)
“双十二”事变经过的概况	白志钧 (473)
“双十二”西安的救亡运动	杨叔吉 (477)
西安事变回忆片断	李藩侯 (478)
绥署装甲汽车队	陈俊英 (480)
西安事变时的空军动态	张有谷 (482)
在国民党空军的见闻回忆	白锦标 (486)
西安事变时在洛阳所见	徐稚兰 (493)
“双十二”事变我的回忆	周光烈 (495)
西安事变中的兰州	张儒彬 (498)
西安事变中的兰州情况	周达夫 (500)
安康军政党人员的动态	张蕴锐 (506)
有关电讯情况的回忆	王昌烈 (508)
桂系对西安事变的态度	程思远 (512)
“双十二”事变后三原的民众运动	张子敬 (514)
西安事变前后九十五师的一些活动	陈远湘 (516)
“双十二”西安事变之后	何镜华 (519)
我所知道的西安事变情况片断	张振林 (535)
西安绥靖公署军法处	庞志杰 (539)
听周恩来在西安事变时作的时事报告	郑志毅 (542)
第十七路军沈、唐两团投蒋经过	公秉藩 (544)
“双十二”事变时冯钦哉部叛变的经过	王明钦 (547)
关于冯钦哉的回忆	刘筱蒲 (553)
对韦锡九写的王经理等被杀一事的订正和加详	王中立 (557)

张学良将军送蒋介石回南京	赵维振 (560)
送蒋回南京后西安方面的反映	李振西 (563)
西安事变军法会审张学良纪实	李贇驹 (569)
西安事变前后的一鳞半爪	赵绍武 (574)
事变后赴华北做联络宣传工作的回忆	陈雨皋 (577)
我离开和平代表团返西安复命	张德枢 (584)
陕西各界和平代表团赴南京呼吁和平经过	康寄遥 (585)
张学良将军二三事	陈大鹏 (587)
西安事变的回忆片断	杨觉天 (590)
有关西安事变的点滴实况	王新民 (594)
警三旅在渭南前线布防	杨复震 (596)
杨虎城和孙殿英协议“经营西北”的由来	常黎夫 (600)
“双十二”时杨虎城主任与于右任的一次通话	白志钧 (603)
陈立夫密谋刺杀杨虎城纪实	褚龙吟 (604)
记杨虎城将军出国前在上海和我的一次谈话	马文彦 (607)
杨虎城在欧洲	秦丰川 (609)
西安事变中杨母蒲城蒙难记	杨大实 (614)
1946年以后我与杨虎城的接触	李玉方 (626)
东北军在陕甘	熊正平等 (629)
为红军赶制棉军衣	杨佩珩 (645)
西安事变后两见贺龙	梁觉民 (646)
西安事变的点滴回忆	杨海峰 (649)
我记忆中的几件事	熊正平 (651)
“双十二”事变后东北军内部矛盾片断	刘汉玉 (655)
第十师在雒南地区备战经过	郑庭笈 (657)
从西安事变到卢沟桥事变	郭孝先 (659)
“二二”事件的经过和真相	黄振华 (670)
目睹高福源被害	张雨辰 (673)
高福源是“二二”事件的无辜牺牲者	赵龙韬 (674)
西安绥靖公署侍从室的成立和功绩	李直峰 (676)
张学良将军的参秘室	林世权 (680)
我在西安事变前后的亲身经历	郭增恺 (682)
第三十六师开入西安的经过	宋希濂 (685)
第五十一军调往西北的经过	李振唐 (690)
蒋介石消灭东北军的一套手法	于泽霖 (693)
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在抗战中被蒋介石消灭的经过	贺奎 (695)

我在东北军抗日战争时期的回忆	王永秋 (707)
在东北军工作期间的回忆	翁麟熙 (718)
“双十二”后东北军的归宿	孙焕彩 (724)
西安事变后的第四十九军	马万钟 (734)
跟随张学良将军前后	赵新华 (739)
十年戎马紧相随	张沛汉 (752)
勤务兵的回忆	傅 德 (755)
张学良与于学忠	惠德安 (758)
回忆王以哲将军	姜明文 (763)
我所知道的王以哲	王凤起 (772)
我所了解的曾扩情	黄光时 (777)
牟中珩其人其事	吴 鸢 (779)
温雅贤惠的少帅夫人——于凤至	石景芳 (783)
关于张学良与四妹绮霞的点滴回忆	赵燕生 (788)
张学良在奉化溪口雪窦山上	钱君立 (790)
羁押中的张学良	韩庆恂 (792)
台湾新竹访晤张学良	岳星明 (796)

西安事变的回忆

卢广绩*

西安事变前东北军内部和国内的情况

我在西北“剿共”总部任第四处处长的经过

我在1936年5月就任甘肃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天水县长的职务。8月下旬，张学良将军电约我来西安。到后，张接见时对我说：“我们内部（指总部的东北人员和东北军）近来在新旧老少间意见分歧，互不团结，很不好。希你来后能做些内部团结工作，特别是总部内部。”因此，我就于1936年9月初，到西北总部就任第四处处长的职务。

原第四处处长周达夫，已随于学忠主席就任甘肃省政府秘书长。周去后很长期间就以副处长王抚洲（王为青年党，后投到特务戴笠的组织内）代理，我就任处长职务后，王调其他工作。同时，张学良还令我兼管新生活俱乐部和大陆团刊社两个机构的职务。

同王以哲军长的谈话

当我尚未就任总部第四处处长职务，住在西京招待所时，六十七军王以哲军长曾去访问过我。他对东北军内部情况感到有些忧虑，一则感觉张举棋不定。拿不准主意；有些偏听一些青年人的意见。希望我最好不要到总部来搅在一起，做不了什么事，反不如在陇南天水专区，还可以在地方做点实际工作。王为我老友，也是我在东北军中所敬佩的一位将领，他同我谈的这些话也使我感到，张同我会见时所谈到东北军内部不团结情况，是有原因的。

西北“剿共”总部内部组织概况

当时西北“剿共”总部的内部组织是这样：在副司令的领导下有参谋长和秘书长，以下为办公厅并设有八个处。除第一、二、三、四四个处以外，还有粮秣、交通、军法、军医四个处，参谋长晏道刚，秘书长吴家象，办公厅主任米春霖、副主任洪钊，一处处长徐方（管军事），二处处长闵湘帆（管军需），三处处长马效韩（管总务），四处处长卢广绩（管行政），此外粮秣处处长张政枋，交通处处长蒋斌，军法处处长赵鸿翥，军医处处长任作楫。除晏道刚和徐方、闵湘帆三人为蒋派来的，余均为张所引用的

* 作者1936年5月任甘肃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天水县长，9月任西北“剿总”第四（行政）处处长。

旧部。另外还有政训处处长曾扩情，虽名义隶属于西北总部，但为另一系统。

我到总部后所遇到的事情

我到总部任职后，有些人感到诧异，特别是在总部任职的一些东北人，因为我在1931年九一八沈阳事变以前，都是在人民团体工作（九一八沈阳事变时期我是沈阳市总商会的副会长）。“九一八”后，到关内，从事抗日救国工作。突然从政，自己也感到不习惯。我在当时有这样感觉，也许个人太主观，就是在张的部下，有一部分人，把权利地位看得重些，虽然经过九一八这样国难巨变，到关内来共度流亡生活，真正有所改变的并不多。记得张1934年从国外回来，住在上海时，同我谈过这样一段话。他由欧洲返国时，有他的旧属曾远迎到新加坡，也有的迎到香港的，在由香港到上海的邮船上，许多人还是欢天喜地玩扑克、麻将来赌输赢，很少有人同他谈国内外情况和抗日救国的事，言下不胜感慨。在我到总部当时，秘书赵雨时（这个人九一八前，在东北给张办过报，这时他已参加国民党）主张东北人应坚决跟蒋介石走，不要脱离国民党中央，极端排斥一些进步青年。黄埔军校毕业的东北籍的军官人数不多，做些副职，谈起话来，倾向国民党中央。其余一些高级将领，当中有些人感到张偏听青年秘书的意见，而感到不满，并不是在政治方面有什么主张。王以哲军长在东北军将领中是比较开明进步的，能代表一部分人的意见，但多数人还是听张的命令，跟张走的，没有什么自己的意见。但是在张的部下具有政治头脑向左右倾的尽管是少数人，在当时是针锋相对，确有剑拔弩张的趋势，放言高论，相互攻揭。特别是苗剑秋和赵雨时两人，苗是倾向左而赵则倾向右，旗鼓相当，各不相下。在我到四处不久，张即下令把他两人都关在西安东城门楼上交卫队营看管，用以镇定一些议论纷纷不负责任的人，当时这样处理有一定好处。

但是在这中间曾发生这样一件事情，也牵涉到我身上。1936年春天我任甘肃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在我离开西安时，我曾为张留一封信，并推荐高崇民、栗又文、应德田、王一叶四人，希望他能留心考察引用。高同张是早相识，但张过去总认为这个人棱角太多，不听使用，栗又文是当时总部上校秘书，应德田是东北大学毕业的，当时也在总部任秘书职。我从国外回来住在西安，同他俩都长相过从，知之较深，认为他们都有卓见有热情，不是一般功利之徒。觉得张对他们认识不够，使他们怀才筹展，深为可惜，建议张能找出时间约他们长谈，并加以考验。至于王一叶比较年轻，同我有师生之谊，识见才学都远高于我，有“青出于蓝”之感，并曾经被我介绍到荆有岩处做秘书（那时荆任豫鄂皖特税局长职），这次由我和荆有岩推荐到总部，张也委任一个秘书职务。但王自到总部后，张从没有找他谈过一次话，这次因苗、赵两人同时被押，他不明真相，同时他对苗、赵两人都过去相识，认为张这样处理不当，给荆有岩写信时对张有些批评。但这封信被办公厅检查出来了，送交张阅，不久张就告诉我说，已将王一叶调回荆处工作。

王卓然到西安向张献策

东北大学秘书长代理校长职务的王卓然，这时来西安，对张一年来对当前国内局

势，有些举棋不定，表示关心。他带了两个人到西安来，一为关梦觉一为李某，并制定两个方案，一个是向左的，一个是向右的，听凭张来采择。最后张采取了向左的方案，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记得当时张每星期规定一定时间，来同我们八九个人一同学习这个方案，最后张接受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正确的方针。我那时虽然在学习，但领会得极不深刻，更不知道有这些经过。

对桂系和平解决后国民党中央军的调动

我到西北总部任职后，因为不娴于政治，对一切政务都感觉生疏，尤其对国内政治各方面明争暗斗情况，更是茫然。有一天，我阅到当时《国内军政通报》内载，广西问题，因陈诚亲往桂林，同李宗仁、白崇禧会见，已确实得到和平解决，过去开往西南去打桂系的国民党中央军，将不会再留驻西南，势必将调出。我这天晚上，在办公会上见到张，我顺便问他：“西南问题，急转直下，和平解决，打西南桂系的中央军，将调往何处？”张因我这一问，似乎也引起他的注意，对我说：“我看蒋将把这部军队开往四川，蒋对刘湘痛恨，比我们厉害。”但是在第二天的下午，就有蒋的电报到，要调25个团到西北来，张除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外，并约吴家象、黎天才、应德田等，向我們说：“你们几个人先谈谈。”老实说，我对当时国内复杂政治情况是很模糊的。

关于西北“剿共”总指挥部

就是在这个时候，才知道蒋介石另委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共”总指挥，事前并没有同张商量。对于今后西北“剿共”任务，已经由蒋介石直接来指挥，不经过原西北“剿共”总部，这是对张和东北军不信任的一种具体表现，张是已经感觉到的。自1935年冬，东北军同红军接触，遭受惨重失败后，张对蒋的在短时期消灭共产党和红军是有怀疑的。同时，也感到蒋令东北军来打红军，不是善意的，因此从1936年开始，虽然东北军大部分都驻在陕、甘边界，似乎对红军采取包围形势，但只是对峙相据，并无大的冲突。张对我曾谈过董英斌军长，在1935年冬同红军激战时，能率一部分部队突围作战，保存实力，不同红军硬拼，张不但未给以任何处分，并认为他能临机应变，保全实力，未遭到重大损失，这样做法是正确的。总之在我到总部以后，发现张似乎不愿让东北军像1935年冬那样同共产党红军硬拼，不想再做这样傻事了。可他对蒋介石还是坚信能够抗日的，并常对我们说蒋是坚决抗日的，尽管在蒋的幕后有亲日派，张仍表示他拥蒋抗日的坚定信心。

张学良曾邀阎锡山同到洛阳去说服蒋介石

1936年秋，蒋介石在洛阳度他五十岁寿辰，张借为蒋祝寿的机会，特用他自己乘坐的飞机，把阎锡山从太原接来，一同前往洛阳，共同说服蒋介石，希望蒋能改变他的违反全国人民意志的“安内攘外”政策，停止国内战争，枪口一致对外。但阎锡山同蒋介石长谈以后，出来向张说：“蒋固执己见，一意孤行，是说不通的。我回晋以后，部署我的军队做守土抗战准备，希你也做你自己的打算好了。”张大失所望，但在回到西安以后，还是不甘心，又给蒋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痛切陈辞，有“家仇国难集于一

身，东北父老盼望国军收复失地，有若大旱之望云霓”之语。但蒋收到张的信并未作复，不久蒋介石即到西安，驻节临潼华清池温泉。

蒋介石在王曲军官训练团的讲话

蒋介石到西安不久，就在王曲军官训练团召集在王曲受训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军官讲话，张学良副司令同杨虎城主任都出席。开始讲话时，蒋独自在台上，张副司令站在台下头一行，杨虎城主任站在第二行。其余军官都排列在后边，约有五六百人，都是由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各部调到王曲来学习的。蒋说：“当前在我们身边的主要敌人，是共产党，我们应该集中一切力量，来消灭他们。至于日本军，是远在千里外的敌人，我们将来要打。假如现在我们不集中力量来打眼前的主要敌人，而大喊大叫要打几千里外的敌人，那是违反我的“安内攘外”的政策。违反这个政策的，就是反革命，反革命我就要打倒他！”蒋说到这几句话时，声色俱厉，激动异常。在蒋讲完话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军官，都表示极大愤慨，情绪大哗，极不稳定，感到大失所望，特别是在王曲受训的东北军官。曾记得在蒋的讲话当天晚上，张即召集在王曲受训的主要领导人和队长等讲话，加以安慰。张说：“大家要明白蒋的今天讲话，主要是对我说的，不是对你们，希望你们要安下心来。要知道我们今天是孤臣孽子，谁叫我们把自己东北家乡丢掉了呢？我们应当有最大的忍耐和克制。”这样使大家情绪安定下来了，但从此也更认识到蒋介石反动的顽固本性。

关于“抗日同志会”的组织情况

张学良为了在东北军内部培养真正具有抗日救国、复土还乡坚定意志的新生力量，秘密成立“抗日同志会”的组织，吸收和物色有抗日思想的志同道合的人参加。我到西安后不久，也参加了这个组织。会是才成立不久，尚未制定任何章程，只是在参加入会时举行很严肃的宣誓仪式，张学良亲自讲话。在军队中参加的多为团长级干部，文职中参加的不太多。举行仪式时，张有时因公务忙未出席，我曾代表张讲过话。西安事变发生后，这个会已无形解体，竟有哪些人参加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时间短而又有严格选择，估计参加人是不会太多的。誓词共四项：（1）坚定复土还乡的信心和决心；（2）中国人不打中国人；（3）坚决听从张副司令的命令；（4）……

张学良参加西安围城十周年纪念会并讲话

1936年10月间，杨虎城主任举行盛大的“西安围城”十周年纪念会（“西安围城”是1926年的事，当时守城的是杨虎城和李虎臣，外边围攻的是刘镇华的部队，刘军围困西安城达八个月之久，因饥饿而死近万人。以后冯玉祥派兵来援，刘镇华兵才撤退，被围始解除），除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参加外，东北军驻在西安的部队和高级将领都参加了这个纪念大会，张亲自参加并在大会上讲话。他在讲话中最使人感动的有这样几句话，就是：“一个人必须具有必死的决心，才可以求生。”讲到这句话时语气激动真挚动人，当时在会场上许多人，特别是参加会的东北军，都为他的沉痛讲话而落泪。虽不能说预兆张将有什么非常举动，但确实给我们这些东北流亡的人一种激励，虽事隔多

年而我尚记忆犹新。

西安市学生举行“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游行示威

北平学生“一二·九”运动一周年时，西安市的学生举行盛大的纪念会，并游行示威，这是在西安事变前三天的事。学生情绪极为高昂，一定要去临潼请愿，要求蒋介石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当时陕西省绥靖主任杨虎城、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都出来向学生讲话，劝阻学生不要前往，一再说服都无效果，游行队伍已行进到灞桥^①。这时张赶到向全体学生作极其生动和沉痛的讲话，使全体学生受到极大感动，感觉满意，遂列队返回。就当时实际情况，蒋介石确已下命令驻军和宪兵，在临潼布防，学生如敢前来，决以武力对待，其未酿成一场大流血的惨剧。

西安事变 蒋介石被扣留

从1936年12月12日把蒋介石扣押起来，到12月25日，经过协商得到和平解决。张学良并亲自把蒋介石送回南京，时间虽然仅是十三四天，但在当时确实是轰动全国，甚至也可以说轰动全世界的一件大事。现在所谈的，只是就我所亲自参加和知道的一些事情。

草拟西安事变八项主张通电稿

1936年12月11日晚8时左右，接张通知，约我立即到金家巷张的私邸，同时被约的还有黎天才和高崇民。到后，张就对我们几个人说：“今天夜里我要暴动，扣押蒋介石举行‘兵谏’，请你们几位来草拟通电稿。”并指示我们如何起草，提出他的八项主张，就是：（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的一切政治自由；（7）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当由黎天才起稿，我同崇民参加修改。最后由张核阅即行拍发，同时张对我们说已另给宋子文密电。

当夜12时左右，我们先后到新城大楼，即杨虎城主任陕西绥靖公署所在地。我曾问张，军事部署怎样安排，他说：“你不要管了，我自有安排。”

在临潼逮捕蒋介石在西安逮捕中央人员

1936年12月12日早4时左右，即听到枪声。这是在西安市内，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解决在西安的中央警宪各部队，约两小时左右就完全缴械和逮捕。并知道驻在西安的中央宪兵团团长杨振亚被枪决。当时张副司令、杨主任两人协商分工，由杨主任负责解决西安市内有关蒋的部队和中央人员；驻在临潼蒋的宪兵和卫队，由东北军负责来解决。在早6时临潼部队来电话，知已经开始行动，张学良、杨虎城同我们都是极度紧张中

^① 原名浐桥，以下不另注。

等待临潼的电话报告。到早8时，已经知道把华清池温泉完全占领，但未发现蒋的踪迹，有人判断可能乘小飞机逃走，也有人说蒋自杀，揣测纷纷莫衷一是。这时部队正在搜索骊山，不久就有消息传来，告知蒋已被擒获，由白凤翔师长和孙铭九营长押送到西安，先安置在新城大楼内。我在旁看张这时情绪较安定，因张很担心，怕把蒋伤害。当时张即对杨虎城说，稍候一时，我们得去见他。杨虎城笑着说：“我不去。”张很严肃地对杨说：“原来是怎样商量的，不但要见他，说好了，我们还要把他送回南京去。”在扣押后当天第一次去见蒋，杨未去，只张一人前往见蒋。

西京招待所是当时西安惟一的高级旅馆，国民党中央和各地方来的要人都住在这里，东北军一些高级将领也住这里。11日夜里，西京招待所里的所有人员都被杨的部队看押了，许多人未来得及穿好衣服。我记得在逮捕时，中央来的邵元冲曾负重伤，不久死去；东北方面胡若愚（原青岛市长）脸面中弹，由右颊入左颊出，未伤及牙齿和口内其他部分，不久痊愈。

住在西京招待所的中央军政人员，陈诚、朱绍良、蒋百里、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万耀煌、陈继承等人，东北方面马占山、鲍文樾、胡若愚等。

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也被请到新城大楼内，暂时限制他的自由。邵的夫人傅学文，曾负微伤，张和杨两人都深表遗憾，并由杨主任夫人去慰问。

张令我去慰问蒋百里先生，他仍住在西京招待所内未动，原住在西京招待所的国民党中央要人和东北军政人员，都被移到别的地方去了，只蒋百里先生一人仍留在此地。我去看他时，只穿一件小绸棉袄坐在床上。我代表张先生来慰问，并同他说：“不久张就要亲自来访晤。”我看他很从容，无一点惊怕急躁情绪，并同我谈今后抗日准备工作，但是他的语言，我还有些地方听得不太清楚。在1933年长城抗战时，朱子樵将军来北平，成立“东北热河抗日后援会”，朱将军曾拟约他来参加主管军事。因此蒋介石对朱子樵产生怀疑，认为朱子樵既是做抗日后援工作，为什么要约这样一个军事专家来相助，以后就没有约来，因此我对他有印象。下午遣人为他送去一件羊皮袍，借以御寒。

张还令我去看唐淮源师长，他是中央第三军的师长，第三军是云南部队，将领多为云南人，为北伐时朱培德的旧部。唐住在西北旅社，当我去见他时，他很战栗，面色也不好，怀疑我是带人去逮捕他。我在陇南任甘肃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时，第三军军部和师部，都在天水，我们有过联系，彼此都很熟。在8月间我接到张的电报来西安，临行仓促，也不知张约我究竟为何事，同时觉得两三天便可以回来，所以就没有告诉他们，三军将领对我有些误会。因为那时正是红军北上，经过邻境甘谷关子镇一带，他们造谣说我临阵脱逃，公开骂我，特别是唐淮源师长，他以为我去看他，必将是借机报复。经过交谈后，他神色安定，表示他们第三军同东北军处境一样，遭到歧视。遂即引他去见张，加以温语，并允许第三军部队，可以靠近东北军驻防各部队，相互照顾。

关于边业银行经理王景越的死

张学良在东北办有边业银行，总行设在沈阳，九一八沈阳事变后，将总行迁到北平。1935年，东北军开赴陕甘，边业银行也在西安设立一个分行，办理一般银行汇兑

存放款的事。经理王景越人极老实，当12日早，杨主任的部队搜查在西安的各银行时，也把边业银行同样加以搜查。当时西北“剿共”总部一位职员叫张乃强，寄居在行内，当部队搜查完毕将离去时，张说些不太礼貌的话，被搜查部队的人听到，返回室内，便拿出手枪把张乃强和王景越经理打死。当有人报告，我即赶到行内看两尸横卧地上，即入棺殓掩埋，并报告张，张当时唏嘘不置，杨虎城闻之，也极为惋惜，并厚恤其家属。

发表杨虎城主任为陕西省政府主席

张在西安事变的第二天即正式发表杨虎城为陕西省政府主席，一切有关陕西地方行政事宜，交由杨主任负责，特别对我讲，不要推荐人。但杜斌丞秘书长和续世甫财政厅长还是一再向我说，一定要在东北人中物色一些能担任县长和税务局长职务的人，因在陕西人当中一时也找不到这些人，经同崇民商量，推荐数人，交杜斌丞秘书长委任县长和税务局长职务。

成立设计委员会

在我到甘肃天水以后，张经常约高崇民谈话，中央很注视他的行动，并传言要逮捕高，这样便把崇民隐藏在杨主任的一位军需处长家里，平常不外出。我到西安后，常同他会面。西安事变的前夕，张把他接出，当成立设计委员会时，请崇民担任主任委员，东北和陕西双方都有人参加，算是一个出谋划策的机构。杜斌丞、李维城都参加，我为委员，多管财政金融和联络各方面的事情，我知道在陕的银行库存硬币还有几十万元。

国民党飞机来西安上空示威和南京的混乱情况

西安事变当天和第二天，都有国民党中央空军飞机，成批飞到西安上空，低飞示威，但并未投弹，在渭南华州曾投弹，焚毁几个仓库。听广播，南京方面似陷于极度混乱状态，亲日派何应钦大为活跃，拟乘机夺取蒋政权，置蒋于死地，主张成立讨逆军轰炸西安。当我们通电发出后，知道了蒋介石尚活着和发动这次事变动机，完全是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无加害蒋的任何企图，同时张除给宋子文发电报，也给宋美龄发了电报。这样在南京方面内部，多主张用和平方法来争取释放蒋，而不应该诉诸武力。特别是宋美龄在此紧张时期，用种种方法安定一些出身黄埔军校的官兵，不执行何应钦的讨伐令，因此何应钦的阴谋和奸计，未能得逞。

端纳来西安和蒋介石迁居

12月14日，蒋介石的顾问端纳携同黄仁霖，乘飞机到西安。端纳是澳大利亚人，原为张的顾问，以后到蒋介石处任顾问；黄仁霖为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的门婿，以前也做过青年会工作，后任南京励志社的总干事，又担任新生活运动会的总干事，同宋美龄接近。端纳因为同张是旧相识，到西安以后，就由张陪同端纳和黄仁霖会见蒋。在这两三天内，蒋的心情极度不安，张认为新城大楼蒋的住处室内温度不够，也是为了蒋个人安全，怕出什么意外，所以愿意把蒋接到玄风桥高桂滋军长的住宅，同时距张所住的金家巷私邸也很近，便于保护。但经张几次向蒋相商，都遭到蒋的

拒绝，最后有一次孙铭九卫队团长在晚间前往，拟强制其迁居，蒋错误地认为是要处决他，更加战栗恐惧。端纳来后，并有宋美龄的亲笔信。据张对我说：“宋美龄给蒋的亲笔信内容是劝蒋要心平气和地同汉卿（汉卿为副司令的字）、虎城两人悬谈，须知南京方面，内部戏法之中还有戏法，并不如你所想的那样美妙。”同时张也恳请端纳向蒋婉言相劝，这样才能使蒋相信张对他无恶意。当天下午，就由端纳和张陪同蒋，乘车一同到高桂滋宅住下。因为室内舒适和温暖，并阳光充足，蒋这时稍感放心，也在这时才知道张、杨两将军确实不想加害他。

周恩来先生到西安

大约是在12月13日，张副司令用自己所乘的波音机，到陕北接周恩来先生，当日到西安^①。一天早晨，我刚起床，王炳南（这时王任杨虎城主任的秘书）陪同周先生来看我。我那时住在西安四皓庄，见面后谈询周先生在幼年时期，是否曾在沈阳读过书，因此知道彼此是髫龄同学。那时还是清朝末年，同在沈阳大东关鲍觉寺“官立第六两等小学堂”。记得我当时是在乙班，周先生在丁班，因为每周同作一个国文课题，周先生年少聪敏，才气纵横，每作一篇文章，总是获得老师们的赞扬和推许，并揭示在板上，供同学们参阅，彼此也都相识。关于周先生当时作文和我的作文，因为每半年举行全沈阳城各中、小学会考，评选时认为优秀者装印成册，这册会考文选现在还保存于辽宁省图书馆。虽然我们已相别二十多年未见面，但周先生的名字，我是记得很清楚的，相见之下欣慰非常，但看见周先生当时面貌清癯，想见在长征后乍到陕北环境的艰苦。

缪激流军长在蒋的侍卫左右“献殷勤”引起张对高崇民的不礼貌

在蒋的周围，也有为张做耳目的人。有这样一件事情，东北军缪激流军长，在西安事变前几天，蒋在临潼华清池住处曾传见过他。缪在见完蒋后，出来同蒋的侍卫人员献殷勤，自言自语地说：“副司令对委员长是忠心耿耿的，只是近来在周围出现宵小，张副司令耳软，被他们包围。”不知道这些话竟为张所知，在西安事变前的一个晚上，张传见王以哲、缪激流和刘多荃几位高级将领，张没有什么含蓄的，当面质询缪：“你在临潼见委员长后，竟讲些什么话？”缪当时感到很窘惊惧竟无辞以对，只表示对张的忠心耿耿，言下落泪。张继续说：“你到那里卖糖有什么用处？”这是刘多荃对高崇民说的，想必是事实。因高崇民是个耿直人，心里搁不得事，便对缪存一种鄙视的心情。

当时国内外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和阎锡山电报对张的影响

自从12月12日在西安把蒋介石扣押起来以后，引起国际和国内各方面极大震动，除散见于当时的国内报纸外，我记得有这样几方面的事，颇引起张的注视。就是在国际方面，英国的态度鲜明，表示支持南京国民党政府，并造谣说我们要向蒋索价8000万元；苏联塔斯社的报道，据说，对西安事变也有些微辞，并怕南京国民党政权落在亲日派手里。在国内方面，看到宋哲元和韩复榘相见于泊头镇，所谓“泊头会议”发表模

^① 周恩来是1936年12月17日到西安的。